



■郭英剑

在美国,如何识别“野鸡大学”

“野鸡大学”的说法来自中国。在美国,同样的说法也同样直白,被称作“文凭工厂”(diploma mill)或者是“学位工厂”(degree mill)。为了表述的简洁和方便,以下统称的“文凭工厂”,也包含了“学位工厂”的意思。

先从一个实例说起。稍微关注中美高等教育的人大概都知道,美国有一所狄金森州立大学。该校从去年被媒体曝光有贩卖文凭之嫌(且当事学生绝大部分为中国留学生),到今年被调查和被证实确有此事,这导致该校涉案的教育、商务与应用科学学院的院长拉普兰特教授自杀身亡,主管留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引咎辞职。

该校被有些人认定为美国人所称的“文凭工厂”。而在中国,到今天为止都还有人把它列在“野鸡大学”的黑名单之中。但应该说,虽然该校上述做法确有违法之处,但还不能被称作“野鸡大学”或“文凭工厂”,因为此前它是一所经美国教育机构认证的正规大学。

据该校网站以及相关认证机构网站显示,今年 7 月 11 日,该校接受了美国六大区域认证机构之一的“中北部学院与学校协会”的评估。结果是,该校虽然依旧留在了认证名单之列,但被要求在 2013 年 5 月前作出重大改进。之后,该协会还会安排评估小组前来视察,并在评估报告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于 2013 年 11 月作出进一步处罚决定。

当然,获得认证机构的认证,并不说明一定不是“文凭工厂”,确有少数“文凭工厂”得到相关部门认证的例子,但就狄金森州立大学而言,还有更多的方面可以说明它并非一所“文凭工厂”。这并不是在为其涉嫌贩卖文凭的行为开脱,而是想仔细讨论一下,究竟怎样才能算作“文凭工厂”。

野鸡大学 vs 文凭工厂

那么,在美国,什么样的高校才能被认定

为“文凭工厂”呢?

“文凭工厂”是指那些授予未经认证的文凭或者学位的公司或者机构。人们获得这类文凭只需付出一定的费用而基本不需要接受任何教育,或者接受的是残缺不全乃至等而下之的教育,而所付出的费用要远远低于正规高校需要交付的学费。

虽然数量众多,但一般来说,这类“文凭工厂”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属于公开出售文凭的,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类“学校”有各自的代理人,他们直接将文凭贩卖给客户。这类“学校”的特征是,“文凭工厂”和客户双方都知道,他们所买卖的文凭是非法的。因此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文凭,对方都能提供。

第二类则更有欺骗性,因为它们貌似一所正规的高校,似乎也在提供而不是贩卖文凭,而且提供的是“合法的”文凭。它们一般会声称提供快速学习课程,也会要求学生做一点点工作,但一般来说,它们都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比如几周或几个月)就“授予”文凭或者学位。

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所大学,这就是美国“野鸡大学”特别多的原因。但总的来看,人们所说的“野鸡大学”或者“文凭工厂”还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

首先,这类高校都有一个与传统的知名高校相近的名称,因此,一定要仔细比对。而且还要查看这类学校是否为美国权威认证机构所认证。有时即便该校写明为某机构所认证,但有些认证机构并没有获得美国教育部的批准;其次,这类学校往往会向学生提出一些过分美妙的承诺,如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学位,凭工作经历也可以获取相应学分等。

再次,所收取的费用是文凭的费用,而不是像正规高校那样告知所收取的是学费,或者是按照每一课程或者每个学分来计费的。

最后,这类高校的网站有别于正规高校

的网站,比如没有.edu的网址、没有电话号码、联系地址为邮政信箱或者是公寓号码等。

美国高校资质的认证机制

掌握了上述“文凭工厂”的共同特征,对我们如何鉴别就会有所帮助。但如果对美国高校资质的认证机制有所了解,更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隐蔽性较强的“野鸡大学”或者“文凭工厂”,也会加深我们对美国高校体制的认识和了解。

在美国,高校的建立需要“批准”和“认证”两个阶段。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两个阶段分别由两个不同的部门来完成。前者由(联邦或者州)政府教育部门来完成;后者则由行业性的民间组织来完成。而衡量一所高校资质的首要外在标准,就是要看其是否被权威认证机构所认证。

这里面有几个概念需要解释。第一,何为认证?所谓认证,就是判定一所高校是否符合一定的教育标准,并能在未来保持其相应的教育标准。认证已经成为一所高校是否达到行业所制定的标准的标记。

第二,什么是认证机构?什么又是权威的认证机构?所谓认证机构,就是判定并规范教育标准者。美国据说有 160 余家认证机构,但真正被认可或者说权威的,包括两个层次的认证机构,第一是六大区域性认证机构,负责对高校的综合实力进行认证;第二是专业认证机构。除此之外,远程教育的认证机构主要为远程教育培训委员会。

第三,如何查证认证机构是否权威?很简单,登录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和美国教育部的网站,查找相应的认证机构即可。如果没有,即可被视为至少是非权威的认证机构。

那么,认证为什么显得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一所高校没有获得认证,那么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学还是相关部门及其雇主,都不承认该校毕业生的文凭与学位。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文凭工厂”所涉足的领域主要在网络课程之中。因此,对于想要通过网络学习的人来说,需要特别警惕。

发现上当怎么办

在美国,如果使用“文凭工厂”的文凭被发现,就有可能导致人财两空。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被无处不在的“文凭工厂”的美好广告所欺骗。那么,只要不是有意要去购买这类“文凭工厂”的文凭,一旦发现自己成为了“文凭工厂”的受害者之后该怎么办呢?

在美国,一旦人们发现自己被骗,会立即提出要求退款。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文凭工厂”所提供的地址发出一封挂号信,解释自己是上当了,要求全额退款。同时,要把这封信备份。尽管要回这笔费用的可能性很小,但通常人们认为发出这样的信件很重要,因为它可能成为你未来需要时的证据文件。

然后向美国商业改善局发出一封投诉信。该局在收到这样的信件之后,会向社会发出警告,提醒其他人不再上当。这样的投诉在网上就可以进行,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同时,还应向所在州的司法部长办公室发出一封投诉信。该办公室会阅读该信,还有可能对您所报告的“文凭工厂”展开调查,从而使之受到处罚或者责令其关门。

在中国,对于有明确目标要到美国去留学者,除了上述知识可供自行判断之外,还可以通过中国留学基金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领事馆)网站等众多信息来源及其相关信息,判定一所高校是否为“野鸡大学”。

校长践行理念需更充足时间

■本报实习生 孙诗月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大学校长这一群体总是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他们以其独特的品格、抱负以及治学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然而,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校长的使命却有所不同。

不久前,由山东教育出版社组织编撰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第二辑)之《忠信笃敬声教四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正式出版。该书作者、暨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夏泉研究员用生动的笔法,探寻了暨南大学老校长、著名学者何炳松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时空留下的足音。

事实上,除了对于何炳松的研究外,浸淫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多年的夏泉,对于“大学校长”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夏泉讲述了不少历史时期他心目中的校长品格。

民国时期校长的士大夫品格

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大学校长出现在清末与民国时期。一提到民国,我们通常会想到战乱频仍和跌宕起伏,但就在如此动荡飘零的年代,却从各大高校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在夏泉看来,这和当时校长们的士大夫品格是分不开的。

“所谓士大夫品格,即他们对道德和人格的重视,以及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责任担当意识。”他说。

中国儒家文化自古就非常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民国时期的校长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们对别人都是十分包容的”,夏泉表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无论观点是否一样,他们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是非常爱护与尊重的。

以夏泉所著传记的主人公何炳松为例。当时,何炳松就对暨南大学有些教授的观点并不赞同,但当他们陷入危难的时候,何炳松总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何炳松的学生们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但当学生生命受到威胁时,他都会积极营救。“不管是从生活上还是学术研究上,校长的包容无疑给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在抗战烽火中,国家处于危难动荡之际,校长们带领学校师生辗转内迁,坚持办学,只是为了让民族的文化薪火免于熄灭的厄运。夏泉表示,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民国大学校长一直在坚持他的办学理念,在外敌入侵时,勇于传承民族文化薪火,办学不辍,这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担当精神。“越是到危难时期,越要坚持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校长们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

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沦陷区,大学就像大海上的灯塔,照亮茫茫黑夜。而这些优秀的校长们,就是这座灯塔得以持续燃烧的灯火。

大学应有自己的“格”

进入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学所处时代环境,办学规模与民国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很多人还是喜欢将现在的大学校长

群体和民国时期进行简单对比。对此,夏泉表示,目前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校长的群体人数庞杂。“两者已经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毕竟环境和时代都不同了。”

在他看来,如今大学校长有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现代的很多校长有着自己的抱负和独特的办学理念,他们希望在自己的任职期间对学校有所建树。”夏泉说,而从外界环境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如今大学校长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高校和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摆在高校校长面前的一个课题,也是对大学校长智慧的考验。”夏泉表示,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对高校的诱惑力在日渐增加,高校既需要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诸方面因应时代的需求,同时又要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高校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如果一所高校孤守象牙塔的话,就会被社会抛弃;但如果高校远离象牙塔,被

动地适应社会,又会丧失其应有的气节。“就像有人人格一样的,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校格’。”夏泉说。

为此,夏泉建议有关部门对大学校长的任期能适度延长。

“这样做有利于大学校长将自己的办学理念更好地实施下去。”夏泉解释说,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任职时间一般都较长,通常的任职都在 10 年以上,而现在的校长任职时间一般只有 4-8 年,有些甚至更短。而过短的任职时间显然不利于其治校政策的推进。毕竟一套教育理念的实施需要有一个渐进过程,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不需要严格遵守 60 岁、65 岁的退休年龄,更不应该将公务员的任职年限简单套用到大学校长身上。”夏泉说。只要任职时间足够,有作为、有理念的大学校长就会给一所大学打上深深的烙印,毕竟校长给学校提供的是一个前进的方向,他们是大学这艘航船的掌舵人。

开设“雷人”课程须把握“度”

■本报记者 陈彬

只要对近期的高等教育新闻稍加注意的人,相信对“爬树课”一词不会感到陌生。上个月,厦门大学发布微博称,厦大将开设爬树课。在该选修课上,教授学生如何安全爬上任何树。此新闻一出,立即引起一片关注。

也就在此新闻出现后不久,远在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传来消息,在国内风靡一时的“三国杀”游戏,被该校正式列为秋季学期的选修课。

两个不同国家,同样有些“雷人”选修课设置,引发了人们对选修课该教些什么的热议。就此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唐安国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可以作一个类比。”唐安国说,在此之前,有些学校曾在选修课程中开设围棋课、

象棋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议论。爬树和“三国杀”在本质上与这些棋类运动有什么不同吗?

在他看来,此类课程其实可以统称为“游戏类课程”,“大学阶段的课程在大类上可归为两条线,一是促进学生在学科方向上的发展,锻炼其思维方式,此类课程在专业课和一些选修课中都有体现;另外一类课程则用以促进‘人’的发展,即提高学生生活能力、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一般的游戏类课程起到的也就是这样的作用。”唐安国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无论爬树课还是“三国杀”课程,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事实上,这类游戏课程在国内大学中早已有的,除之前提到的象棋课、围棋课外,包括酒文化、爱情心理学等课程也曾出现在国内高校的选修课表中,“爬树课只不过是此类课程中,

一个相对极端的例子而已。”

虽然肯定了此类课程的正面意义,但在采访中,唐安国也强调,高校开设游戏类课程必须注重在课程结构上的把握。换句话说,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这就好比人体摄入营养,我们不能天天大鱼大肉,但同样不能每天以青菜度日。”唐安国说,对于学生的知识传授同样如此,游戏类课程与一般的专业类课程之间,必须维持相对合理的比例。“选修课的内容设定必须要产生对学生的吸引力,否则开设选修课便没有任何意义;但同时,校方也要设定一个上限,对此类课程的课时总量有总体的把握,这种把握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调整,但必须在制度上作出明确的规划。”唐安国说。

他山之石

栏目主持: 年智英

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风靡全球的世界大学排名对大学学术卓越竞争力的强调,驱动着世界各国纷纷把“卓越”作为调整大学学术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选择。加州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以其对学术卓越的不断追求,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加州大学(伯克利)作为世界公认的全美最好公立大学,学术声望享誉全球。1906 年,加州大学进入全美“六大”大学之列;1934 年,在全美大学排名中,该校被誉为“美国卓越大学”;1964 年,该校又被誉为“美国最稳定的卓越大学”。迄今为止,加州大学已有 21 位教师荣获诺贝尔奖。仅从 2009 年 6 月至今,加州大学就研发出 2217 项发明成果,其中获美国专利 569 项、国外专利 465 项,签署专利技术开发许可协议 300 项。

在美国,博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是评价大学学术质量的关键指标。根据全美研究委员会 2011 年公布的结果:在对全美 212 所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培养项目学术评估中,加州大学博士项目总体学术质量位居首位;在教师竞争力和所取得的科研成就方面,该校 52 个学术领域中有 48 个均排在全美高校前 10 名。

学术卓越的生成逻辑

加州大学能产生卓越学术,是有一定逻辑性可循的。

首先,在加州大学长期历史发展中,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多元融资渠道,为其学术卓越提供了资金保障。其学术资金主要来源于州政府、联邦政府、基金会、私人慈善组织等。联邦政府是加州大学学术研究经费最重要的来源。借助联邦政府投资创办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和曼哈顿计划大大促进了该校科学领域的学术实力,成为加州大学学术卓越的最大驱动因素。此外,加州大学也积极吸纳国内外基金或慈善机构、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国内外商业协会的学术资助,并与产业部门合作,吸纳产业资金,这些多元外部筹资来源为其学术卓越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其次,追求“学术卓越”是加州大学历届校长的一贯办学理念。早在吉尔曼时期,加州大学就提出了“通过开展与加州面临经济挑战相关的科学研究最好地服务于加州利益”的办学理念。之后,惠勒首次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斯普劳尔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招纳卓越贤才,把“鼓励和支持学术卓越”作为他的领导原则。克拉克·克尔被誉为“现代伯克利的设计者”。他的根本目标是将加州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全美顶尖大学。可以说,加州大学坚持不懈的“卓越”价值追求孕育了其学术卓越。

第三,以学术评议会为核心的共同治理制度为加州大学学术卓越提供了重要保障。1868 年,加州大学设立了由校外人士构成的董事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校长领导、所有教师和各院系领导构成的学术评议会。惠勒任期时,赋予了学术评议会多项权力,确立了学术评议会的独立地位。自此以后,历届校长对董事会和学术评议会的规章制度与治理结构不断革新和完善,奠定了加州大学现代意义上的共同治理制度框架:在董事会下两个既并列又有必要重叠的决策体系,即学术评议会和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机构。在共同治理制度保障下,加州大学人才辈出,确保了加州大学世界卓越的学术水准。

最后,为提升学术卓越水平,加州大学不断创新知识生产方式。加州大学高度重视与产业界的合作,创设了“知识产权和产业研究联盟办公室”,为加州大学与产业研发合作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促进加州大学学术研究的高情境化,形成了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知识生产共同体,知识生产组织形式灵活多样。

新知识生产观值得重视

从加州大学学术经验发展看,充足的科研资金是确保学术卓越的必要条件。我国高校应该采取“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产业部门的科技合作,并积极开拓与国外企业研发合作活动的新途径,吸纳国内外各产业界的研发资金;同时,应通过各种基金会组织,积极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并积极探索吸纳国外慈善基金会资助的途径。

同时,加州大学学术卓越生成逻辑启示我们,只有不断地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并以“学术卓越”为践行发展之道,才能不断地提升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竞争力。对此,在政府层面上,正确决策“学术卓越”办学理念,营造“学术卓越”大学文化,应成为提升大学学术品位、提高大学核心学术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选择。

加州大学在确保“学术卓越”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董事会和学术评议会的形式实现了共同治理的制度保障。我国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首先应科学组建学术评议会这一共同治理的核心机构,鼓励全校教师代表参与大学治理,创建大学行政与教师共同治理理念的新型制度模式。只有在这种民主的共同治理制度下,才能促进大学人才辈出,保证大学不断产生原创性学术成果,从而实现大学学术卓越。

■吉本斯等西方学者在《新知识生产》论著中揭示了当前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趋势:传统的以理论独尊、试验性科学、学科内部驱动、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被新知识生产模式所取代。新模式的基本特质表现为:跨学科、应用情景、知识生产参与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知识生产组织形式的敏捷性和灵活性。我国大学必须深刻认识新知识生产观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加强跨学科科学研究项目建设,以问题取向或应用取向引导大学学术研究。在学术共同体的组织上,实施项目管理制,加强学术共同体组织的灵活性和快捷性。

加州大学：一所卓越大学的学术之道

■武学超